



我小时候,住在村里。1976年,我刚上小学二年级,虽然当上了红小兵,可胆子并不大,除了从家里到学校,很少到村里转悠。记得那时的大人常说,小孩子没事不要一个人上街,当心遇到“拍花子的”。大人们说的“拍花子的”,是指有一种人贩子,专盯落单的小孩儿。据说他们会使用一种蒙汗药,在小孩儿面前一晃,就能将人迷晕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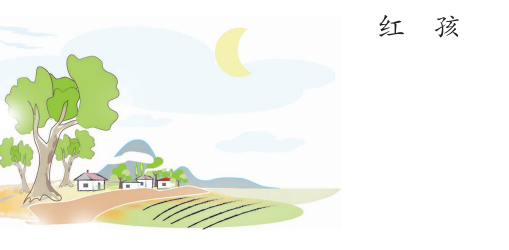
还有更吓人的,就是到我们家门前的河边玩。这条河在新中国成立前是黄土大道,两边是住户,还有商铺。我们居住的双桥地区属于北京东南郊,紧邻通州。在交通不太便利的年代,若要从大运河的北端张家湾前往北京城,我们这个村子是必经之地。有很多人喜欢在我们村的店铺打尖,休息一下,吃顿饭,然后再往北京赶。20世纪50年代中期,京通公路开通,我们家门前三条黄土大道就改成排洪灌渠。这条河,冬天结冰,夏天涨水,两岸长满芦苇,风景固然好看,可大人是不希望我们去河边玩的,说那河边的芦苇里有眼镜蛇,一旦被蛇咬了,就会没命。我在芦苇荡旁边,亲眼看见过一条草蛇把青蛙吃掉,以至于以后我一从河边经过,听到青蛙急促的叫声,便以为又有一只青蛙遭遇不测了。

其实,比起前两种情况,我更怕半夜黄鼠狼抓鸡的叫声。在农村,家家户户养鸡、养猪,也养狗。养鸡是为了让鸡下蛋,下了蛋可以拿到供销社去卖钱。养猪,不是为自己吃,除了养大卖钱,还有个用处就是积肥。在农村有句谚语:“种地不使粪,等于瞎胡混。”至于养狗,唯一的用途就是看家护院。黄鼠狼喜欢昼伏夜出,它们奔跑的速度极快,可以用“一溜烟”形容。从我记事起,就常听到黄鼠狼半夜抓鸡的惨叫声。因此很多人家,天一黑就不敢不赶紧把鸡从鸡窝里轰到堂屋,保护起来。可即便是这样,稍不留神也会被黄鼠狼钻了空子。

记得1976年年初,子夜时分,当我们一家人正熟睡时,突然听见堂屋传来鸡群的尖叫声,还有

锅碗瓢盆掉落在地上的响声。我妈本来身子虚弱,半夜常常惊醒。这突发情况,使她更加害怕,她连忙推醒我父亲,大喊准是黄鼠狼来偷鸡了。父亲一听,赶紧跳下土炕,顺手将灯拉亮,抓起一把笤帚就冲进堂屋,朝黄鼠狼猛打。黄鼠狼这种动物,虽然机敏、狡猾、凶狠,但面对高大的男人,还有声嘶力竭大叫的女人,往往还是会被震慑住的。黄鼠狼见我父

天亮了,但月亮还在



亲来者不善,放下嘴里的鸡,嗖地一下,夺门而逃。我父亲随之开门紧追,这当然只是做做样子而已。而我母亲,看着被黄鼠狼几乎咬断脖子的老母鸡,心疼得将其抱在怀里大哭。我知道,他不光是为了鸡而哭,也是为那贫穷的日子而落泪。

这个惨痛的教训,让母亲留下了病根儿。从那之后,母亲便养成了每天晚上睡觉前,都要把门窗关紧的习惯。即使后来搬到楼房,哪怕腿脚已不听使唤,她也要在临睡前拄着拐杖去看看门窗。

然而,即便做了万全的准备,在1976年7月28日凌晨3时42分,还是发生了一件让所有人都意想不到的事情。

这天,正逢三伏,是北京最难熬的日子。白天,放暑假的孩子们到稻田捉蜻蜓,大人们在田地里劳作,晚上还要挑水、做饭、喂猪。到了九点钟,人们就聚在路边的石碾、磨盘上聊天,男人们说着听来的新闻,女人们则摇着蒲扇扯东扯西。直到夜深,天气渐渐凉爽下来,人们才回家睡觉。

阮一江——我的战友,她的名字,源自一座岛。1955年1月,解放军三军首次联合作战,陆海空万炮齐发,直扑浙东的一江山岛。炮火连天处,父亲阮济舟——新中国第一代飞行员,正在空中执行任务。同一时刻,后方一个女婴呱呱坠地。这个在战火中降生的长女,被父亲命名为“一江”,让一个地名,永远融入血脉;让一场战役,成为生命的起点。

阮一江,从此与那场战役、那座岛屿,生死相系。十四岁那年,她穿上了军装。

新兵训练三个月结束后,唐山255医院内二科,便多了一个爱说爱笑的小卫生员。战友们说她没有女孩子的样儿,像个“假小子”,整日里嘻嘻哈哈,从没见过她愁眉苦脸,仿佛没心没肺,哪里是她,哪里就有一台戏。

有一次,她推着满满一车病号服和需要清洗的床单被套,送往供应室,在长长的走廊里边推车、边歌唱,唱到激情处竟然把小车猛地往前一推,然后撒开车把,就见那车歪斜着向前冲去。“咣当”一声就撞到了墙上。路过的战友被吓得蹦起老高,捂着胸口埋怨:“吓死人啊!”她却咧开嘴,笑得弯了腰。

她是医院宣传队的打击乐手,操起鼓槌一口气能独自敲完整场《沙家浜》,赢得满堂喝彩。那骨子里的灵动,或许来自母亲的家族遗传——天津常氏相声世家。姥爷常连安开山立派,大舅常宝堃牺牲在朝鲜战场,四舅常宝华成了“十大笑星”之一。艺术的基因在她身上流淌成一条隐秘的河,叮咚作响。

阮一江的父亲阮济舟——1938年参军的老革命,时任空军某部副军长;母亲常宝环,1949年入伍。家中五个孩子,一江是长姐。她家的家风极严:衣裳要打补丁,身份要藏在心里。“记住,你们父都是当兵的。”这条铁律,被他们刻进了骨子里。

大弟阮志雄后来回忆:“我和姐姐当兵,都去的陆军——父亲不希望我们当空军,就是怕被部下照顾。”阮一江有一次回家,被哨兵拦下盘问,她只答“我爸是里面当兵的”,始终不肯透露父亲副军长的身份。僵持许久,直到一位相识的叔叔路过,才把她带过去。

她身上没有一丝骄矜之气。科室收治急诊病人,未进病房先泻了一地,病人窘迫得连连道歉,

门就不得由愣住了,这哪里像项目部的样子?就是在一间还没来得及拆的破旧农房上,搭建了个不足十平方米的钢架房,下面就是快餐店,上楼的梯子还在厨房里面。房间里四面挨墙都搭了简易床,中间放了两张办公桌和一台打印机,彭经理和小康,加上公司两个技术,四个人全部睡在里面,床上的被子还保持着起床时的模样,每个人的背包、衣服和其他生活用品丢得到处都是。

小康正在办公桌前整理文件,见许杰和彭经理进来,立即上前打招呼,把资料一股脑儿地放到许杰面前:“许经理,所有资料都在这里了,您看后面的工作怎么安排?”

新官上任,许杰见彭经理有些尴尬,连忙岔开话题。许杰以彭经理租的住房不安全为由,向公司申请,租了一套复式公寓,让小康及工人当晚就搬了进去,自己睡阁楼,小康和两个工人睡下面靠北墙的两张双人床,床下就放比较贵重的电线和工具,中间位置两张办公桌和打印机摆成一排,对面南墙就摆了两个文件柜,新装修的公寓厨房、厕所、淋浴房一应俱全,跟之前简直是天壤之别,这才终于有点儿项目部的样子。小康高兴得一个劲儿夸许经理有本事。

接下来小康的表现也确实不错,早上按时去现场开安全早会,并拍照发给许杰,不用许杰安排,他就会主动收发材料、做资料等。虽然小康如此热心,把什么事都大包大揽,许杰还是坚持亲自到场,安排工人工作,对所有的流程、进度、材料等做到心中有数,不是怕被别人架空,而是担心小康

乡村的夜晚向来安静,只有偶尔传来的几声犬吠。大约半夜两点,院子里的狗突然大声叫了几下,我隔着窗户吼了狗几嗓子,便又翻身睡了。正在沉睡中,猛然间听到我家的玻璃哗啦啦碎裂的响声,声音极其恐怖。我妈第一个被惊醒,她本能地喊:“快起来,进贼啦!”这时,父亲腾地坐起来,顺势把我从被窝里揪起,又把妹妹揽在腋下,一边往屋外跑,一边对我妈,我哥高喊:“快跑,是地震啦!”

就这样,我们全家人都聚到院子中央,此时天空中一片星光,月亮在偏西北的方向挂着,像往常一样静静地俯瞰着大地上的一切。此刻,大街上已经到处都是人,穿裤衩的、光着上身的,大人呼、小孩儿叫,仿佛正上演一台生死大戏。父亲时任村贫协主席,相当于现在的村委会主任,面对突发的灾难,他没多想,当即对我母亲说:“你照顾好孩子,我到村上各家各户看看去。”说完,他就大步流星地走了。

我们四口此时早已没了睡意,就在树下待着,即使渴了、饿了,也不敢轻易回屋里。实在渴了,就一边小心张望,一边蹑手蹑脚地回屋,生怕房子随时会塌。我们盼着天亮,盼着父亲回来告诉我们究竟发生了什么。不知不觉,我和妹妹躺在铺在空地上的芦席上睡着了,那芦席是母亲冒着危险从屋里取出来的。

等我们再次睁开双眼,天已经大亮了。可是父亲还没有回来。有胆大的人家已经开始做饭。母亲把炉子生起来,煤烟味儿顿时充满了整个院子。直到这时,父亲才一脸疲倦地回来,小声告诉我们,听说河北唐山发生地震了。他和书记、生产队长把每一户的情况都看了,还好,只有两三户人家的房子有裂缝,修修就好。只是村西大庙小学校的房子损坏严重,特别是庙前的老槐树居然折了,恐怕孩子们以后再也不能在那里上学了。我一听有些着急,忙问父亲:“那我们的新学校在哪儿?”父亲没有正面回答,这个问题他当时也真的没法回答。

当时我们所能看到的,只是太阳高高地升了起来,可那半个月亮也还在天边悬着,一动不动。

2026年7月2日 西坝河

阮一江并不知道——她住过的那间病房在地震中竟奇迹般地未倒塌。倘若她听了医生的话,不曾出屋,也许就能幸免于难……

当武力军带着轻伤从废墟中爬出,便第一时间赶去救一江。他十指磨破,血流不止,仍不管不顾地徒手刨挖。当他和战友终于从倒塌的宿舍楼扒出一江时,她的头颈已变形,呼吸早已停止。力军从瓦砾中扯出一条白床单,将她仔细地裹好,泪流满面地抱下废墟。

四小时前,他们还在说笑;四小时后,天人永隔。

地震中,一江父母和妹妹也被埋压,幸而得救。天刚亮,母亲跌跌撞撞跋涉十几里路,恍如行走在噩梦之中。当看到面目模糊,身体浮肿的爱女遗体时,她怔住了,喃喃自语:“你们弄错了,这不是我女儿!我的女儿不是这样的……”直到武力军把一江的手表递到她面前,含泪说:“阿姨,真的是一江。”她才终于相信。坚强的母亲没有落泪。她攥紧那只表,默默地转身离开。

女儿身边,还躺着那么多逝去的年轻战友,她不能惊扰了他们的安眠。可回到家,夜深人静时,她用白布一遍又一遍擦拭女儿的手表,头天女儿回家等待父亲时的音容笑貌,闪现在眼前。她泪如雨下,伏在被子下失声痛哭。

那场灾难过后,父亲阮济舟常常一个人坐在书房的写字台前发呆,直至临终都无法原谅自己:为什么那天没能早一点回家?为什么让女儿带着遗憾离开?

大弟阮志雄在地震后的第三天,随部队进入唐山。他很想回家看看父亲、母亲、姐姐和妹妹,但他知道自己是军人,眼下抢救唐山百姓的生命最为重要。他始终奋战在一线,没有提出回家的请求,直至遇见父亲部队的叔叔,才得知姐姐遇难的噩耗。这个年轻的军人,当场泪流满面。

许多年后,通过战友联系,我找到了阮一江的二弟阮志强、樊英夫妇。他们告知:父亲离休后居住天津,1999年病逝,享年七十八岁。此后,他们将母亲接至唐山,悉心赡养。2024年12月29日,母亲与世长辞,享年九十五岁。

问及阮一江的骨灰安置在何处,他们回答:“跟两位老人在一起,安放在天津市烈士陵园。”

闻此言,我心稍安。

在唐山大地震五十周年之际,写下此文,深切缅怀永远定格在21岁、活泼可爱的战友——阮一江。

经验不足,出了问题还是得自己承担。

没多久,许杰和小康二人的关系就处得非常和睦了,工作上配合默契,许杰也对他特别照顾。直到有一天,小康突然委屈地跑回来:“许经理,什么事都要我做,我想在做不了。”

许杰一愣,心想小康平常可不是这样的。“什么都要你做?这话从何说起?”

求生法则

丁照红



“甲方总工脾气太臭。”小康气呼呼地抱怨。许杰拿过他做的资料一看,忍住了笑说:“你这是套用的土建资料,我们这是装修,里面无关的内容你也写上去算了,以后资料这块儿你就不用了。”

不久,许杰发现工地上的水泥被偷了,急忙要小康去工地门卫室调监控,小康也慌了,马上了门卫室,不一会儿就跑回来说,这个区的监控坏了。许杰听了,心里纳闷,但也没办法,只好叮嘱小康以后一定要注重,想办法看看是谁拿了装修材料。

没过几天,水泥又照样丢了,许杰带着小康搞了几次突袭,也没发现问题。他们根据总包方和

每每谈及与当兵有关的话题,鬓毫之年的外公总显得比平时更精神,思维也更清晰。外公年轻时,曾当过民兵队长和营部联络员。那时正值新中国成立初期,各地依旧保留着民兵组织,部队委派营长、连长到各乡镇、村庄,负责民兵日常操练。一个村庄就是一个民兵连,一个乡镇便是一个民兵营。

农忙时,大家同种同收。山区里,往往广种薄收,路也陡,粮食全靠人背骡马驮,夏收入仓前,要挑选出好粮食上交给国家,支援建设。农闲时节,民兵连带着全村老少修梯田,平整土地。正午也不休息,民兵在打谷场受训演练,反复练习格斗、端枪、瞄准、刺杀、隐蔽、撤退;也有实战演习,射击、打靶、投掷手榴弹,人人干劲十足。

外公因综合素质过硬,被推荐到兰州军区集训了三个月,成了民兵队长和营部联络员。如今多少年过去了,外公仍以军人的标准要求自已,一套军体拳打得虎虎生风。堂屋里,外公着军装握钢枪的照片被摆放在最显眼的位置,照片上的外公看上去还是那么英姿飒爽。

除了外公,如今五十多岁的四舅竟也有从军的经历。

1990年,四舅圆了他的军旅梦。当他穿上军装的那一刻,一种自豪感油然而生。

应征入伍报国,是他多年的梦想。兄弟姐妹六人,数他最瘦弱,但他从小就想当兵、穿军装,守卫边疆。1990年,他终于如愿成了一名光荣的解放军战士。那年,他18岁。

四舅当年是炮兵,团部驻扎在库尔勒——距老家两千多公里上的戈壁荒原之上,人烟稀少,风大沙多,沙尘暴不断,一年吹两次,一次吹半年。站军姿时,风沙走石袭来,吹得人迷了双眼,脸也被打得生疼,可所有的士兵纹丝不动,像是一棵棵挺拔的胡杨。

“植树造林,打败大风沙。”这是团部当年的口号。每年三四月还有十月,全团人都要去挖沟、修渠。地表是沙子,挖到一米是土,再往下就要用上十字镐、钢钎、大锤,一干就是一整天。

中午吃饭,一阵风卷过,米饭里全是沙子,大家顾不得,都是埋头就吃。手磨破了皮,结成了老茧;鞋子破了,烂了,大伙儿都毫无怨言。谁都知道防沙治沙、植树造林,功在千秋万代,可要想在盐碱地栽活一棵树,还要挨过极端天气,尤其是抵抗沙尘暴的侵袭,实属不易。

就这样,新兵、老兵、新兵……一茬接一茬,不断地植树造林。

四舅复员后,毅然留在了祖国边

上周末,我去前门喝咖啡,拐弯时,瞥见路牌指向天坛,忽然心头一动,便拽着行李往前走。

红墙在午后阳光里泛着古朴的朱红色,古柏的阴影覆盖在青砖上,像时光刻下的密码。我打开手机相册,2005年夏天的一张照片映入眼帘——那个穿粉色长裤的小女孩,门牙缺了一块,在回音壁的红门旁笑得天真烂漫。

“去复刻一张吧。”朋友提议。挤过人群,找角度,调焦距,我努力摆出相似的咧嘴表情。快门按下的刹那,时光在取景框里重合。朋友忽然说:“那时候,能来北京旅游的孩子,家里条件都不会差。我这个河北人,二十年前都没来过。”

我怔了怔。是啊,那个二十年前被父母牵着逛北京城的南方小女孩,又何曾想过,如今会在此处过着朝九晚五的生活。

忽然,天色骤变,乌云压城,我们小跑着往地铁站奔去。才到半路,冰雹便劈头盖脸地砸下来,落在身上,咚、咚、咚,像远古部落的鼓点。

疆,支援建设美丽新疆。和他一起留下的,还有很多老兵,他们都默默扎根在戈壁。如今,那片沙海已是绿树成荫、瓜果飘香,那些留下来的老兵,将自己的余生献给了边疆,就像一排排挺拔粗壮的胡杨,守卫着祖国家园。

前年国家征兵时,在西安科技大学刚读大一的表弟也投身行伍,成了一名“00后”空军。

当被问及为何选择从军时,他的回答简单而直接,就是想尝试青春另一种可能。正是这个坚定的愿望,引领他迈出了第一步,踏进了西藏那片神秘又辽阔苍茫的雪域高原。

“这一路,缺氧却不缺信仰。”这是他们新兵入伍报到那天,他发的一条朋友圈,时间是2024年3月18日,海拔高度4791.3米。

雪域高原昼夜温差极大加之干燥缺氧,早上起来会流鼻血,稍微运动就会感到疲劳。他们的驻训地都在海拔5000米以上,在那里人即便躺着也会感到乏力,睡觉时总觉得喘不上气。高原反应还带来了一系列问题:肺水肿、脱发、伤口愈合缓慢、频繁咳嗽等。

一次,他笑着跟我讲起当兵时印象最深的经历:“在塔台保障的时候,那边海拔5600多米,不知道为啥两只手都麻了,还出现了低血糖、低血压,整个人头晕眼花。但是,当我一抬头,看到远处的雪山是那么漂亮,脑子里突然蹦出一句话,‘钢钉打不进,人也要扎根’,一下子就精神多了。”

谈到未来的打算,他说:“等到真的离开了部队,我就做回大学生,完成我的大学学业,在我热爱的专业继续努力。”如此淳朴的回答,却那么掷地有声。

穿上军装,站在高原之巅,他的青春底色、人生信仰已如圣域雪山一样,纯粹又炽热,从容且坚定。保家卫国,无需任何理由。而这一路铿锵,定会成为他的青春岁月中最浓墨重彩的一笔。

“万里河山壮丽,军人当为家国天下之坚盾,我愿如此,人人皆然;万家灯火辉映,军人当为执剑守护之卫士,今夜如此,夜夜皆然。”

是的,当你穿上了军装,不管是高原雪山、边疆海岛,还是大漠戈壁,无处不是家乡,无处没有军魂。

文艺周刊

第三〇八六期

南北歧路

童晔



没有伞,我们只好一路狂奔,湿漉漉地站在地铁站口。这让我想起刚来北京时,毫无准备,到处碰壁,被生活的大雨浇得透心凉。

于是,从天坛回家的路上,我掏出手机,把微信签名改为“人生南北多歧路”。

前三十年,从南到北,尽是歧路。我总习惯用诗意包装迷茫,把漂泊说成流浪,将无奈美化为抉择,南方梅雨浸透的青春,北方沙尘磨砺的成年,那些看似自主的选择,不过是命运长风中的身不由己。

我就是这样被风推着向前,落在北方便成了北方客,停在南方便做了南方人。每一次落地虽都弄得满身伤痕,却能从伤口处生出新的根须。

“人生南北多歧路”,命运的每条岔路都通向不同的风景,或荒芜,或茂盛。正如成长,就是要学会在暴雨中继续前行;也正如那些莽撞的奔赴,其实藏着最真实的自我。

愿我们都能珍惜每一天,哪怕前方,依然歧路纵横。

本版题图 张宇尘

也会受牵连,难保结局不会跟彭经理一样。

从那之后,许杰便与小康拉开了距离,公事公办,按岗位责任各司其职,小康年轻又经验不足,没有许杰压场,根本管不住工人。没多久,小康就向公司提出辞职。由于工地到火车站距离较远,又是凌晨3点40分的火车,小康便想请许杰送他一下。

员工离职路上若是发生意外,公司也要承担相应责任,而且不管怎样,二人也共事了这么久,许杰最终选择不计前嫌,特意定好闹钟,早早睡了。凌晨两点的时候闹铃响了,他叫醒小康,将他送到了火车站。临别时,许杰还对小康说:“你小子将来前途无量,一路小心。”然后握了握手,开车走了。

走了十多分钟,许杰竟又接到了小康打过来的电话。小康说是他手机的充电器落在许杰车里了,许杰停下车来找了一会儿,没看见,小康急切地说可能是掉在哪了,他想自己找找。许杰也没多想,就掉头回来了,远远地,他看见小康还站在原先下车的地方。见许杰回来,小康急匆匆地拉开后排车门,把行李箱放了进去,转身坐到前排副驾驶的位置上,说道:“许经理,这里是火车站后门,我们走错了,麻烦你送我去前门。”

许杰这才反应过来,原来他说充电器丢了是骗人的,看着眼前这个自以为是精明世故的年轻人,一股被愚弄的怒气涌上心头。

他脸色铁青地对小康说:“你把行李放到我后备箱里,我刚才接了两个顺风车客人,一会儿上车得让你坐后面。”小康听后微微犹豫了一下,还是下车从后排座位上拿起自己的行李往车后走去。当车准备开后排备箱时,许杰一脚油门,“呼”的一声,头也不回地开车走了。